

第2版

中国

产业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郑海航 戚聿东
副主编/高 粮 柳学信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第2版

中国

产业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郑海航 戚聿东
副主编/高 粮 柳学信

REVIEW AND PROSPEC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产业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郑海航, 戚聿东主编. —2版.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096-2703-7

I. ①中… II. ①郑… ②戚… III. ①产业经济学—研究—中国 IV. ①F12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7628号

责任编辑: 张永美

责任印制: 黄 铄

责任校对: 超 凡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8号中雅大厦A座11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1092mm/16

印 张: 27

字 数: 588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2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2703-7

定 价: 6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电话: (010)68022974 邮编: 100836

目 录

综述	1
----------	---

一、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变迁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19
中国工业改革发展 30 年：1978~2008	27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变化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对我国 1978~2006 年 “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	41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	53
中国服务业进入退出的影响因素——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66
基于“三轴图”法的我国海洋产业结构演进分析	76
基于种群生态学的集群内产业关系研究	84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的竞争力

地方保护、市场分割与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93
北京市制造业适度发展研究	108
适宜技术、制度与产业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实证检验	124
产业特征、创新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	145
生产性服务业与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动态 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156
转型时期我国工业行业技术创新价值链分析	165
产业集群竞争力与知识价值链关系研究	176

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纵向价格双轨制：“电荒”的经济分析与出路	189
成本冲击下企业价格串谋识别的博弈分析及研究	201
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的改革趋势	208
网络经济对运输契约结构与风险规避作用机制分析	219

财政分权、地方保护主义与电力行业管制效率	229
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私有化：改革路径、目前进展及启示	243
行政性价格合谋机制及其福利效应	262
铁路改革中公益性问题的研究	270

四、新型工业化道路

特色背景、路径与模式——对近 60 年中国经济成长道路的评析	281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分析	295
工业反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基于江西的实证	304
传统农业大省迈向工业强省的路径选择——河南的实践与思考	314
中国省际经济发展的“资源诅咒”——基于 Malmquist 和面板数据的分析	326

五、国有企业改革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艰难改革历程——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改革 实验报告	339
对国企改革方案中借鉴日本经验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354
中国企业产权结构与财务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365
专业化的国有企业出资人机构：论国资委的职能定位	375

六、中国产业经济学发展

试析反垄断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兼评布西罗塞《反垄断经济学手册》	391
规制经济学的发展与展望	405
试论产业发展学的理论构架	420

综 述

2008年10月11~12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成立30周年庆典暨“中国产业经济发展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会议中心隆重举行,该研讨会由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办,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和《经济与管理研究》杂志社承办。搜狐财经对会议的全程进行了报道和网络媒体发布。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单位近300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百余篇。大会通过主题报告、主题发言和专题研讨等方式,基于我国产业经济的回顾和展望的视角,对产业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态势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性特征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阶段性特征,在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呢?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江小涓研究员围绕该课题做了主题报告。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显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包括经济和民主政治两大方面。一是经济特征。表现为我国经济发展很快,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但是,从人均水平看发展水平还不高,总体还处在初级阶段;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增强,但是,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还很明显。二是民主政治发展的特征。具体包括社会建设发展特征、文化建设发展特征和对外开放特征。上述特征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六大变化。

(1)生产要素在部门间转移带来的增长潜力在迅速地弱化。工业化、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的生产要素从低产出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转移,其本身就会带来产出能力巨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30年间,大量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水资源、能源、各种原材料,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这个转移的过程就是增长。30年以后的现在,劳动力的转移可能从量上有一定的余地,但是从可转移的劳动力的结构上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17~28岁,叫最优转移段,他们适应现代经济的能力强,受教育的程度也较高,改变自己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基本上转得差不多了,那么在段外还有一部分劳动力,他们相对适应经济的能力就弱一些。再有,必须保证国内基本的粮食需求,这一点共识不断增强,从这一点要求来讲,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空间很小了,和前30年相比,已经大大缩小。所以,过去30

年,我们靠要素部门间转移带来非常大的潜力,在下一步会比较快的弱化。

(2) 就业压力的结构性变化。除了总量,还有供给的压力,主要是结构性变化的压力。大学扩招以后,我们每年 500 万~600 万的大学毕业生还有相匹配的岗位。现在职业教育的高等职业教育数量也在急剧增长,千万左右规模的中等职业学校以上的毕业生,他所希望匹配的岗位和前 30 年是不一样的。起码大专以上 500 万~600 万人不会到一线很辛苦的装备加工岗位工作,这不是他希望的就业目标。怎么和教育水平迅速提升了以后,和他们的希望相匹配,提供适应他们的就业岗位,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如果岗位不合适,比如,城市里面的大学生,这个压力带来变化的背后会有一系列的问题,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有社会问题,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这都是在这 30 年出现的变化。

(3) 长期成本上升的趋势。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加速,土地成本上升更快。过去 10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大,平均一年超过 13%。从内在讲有市场推动的力量,由于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给宏观经济面带来一些比较快的调整压力。除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外,土地成本上升更快了,上升的速率以倍数计,不是百分数。

(4) 传统产业出口增长的能力在下降。无论是从国内成本竞争能力的变化,还是从国际市场环境的变化上看,我们传统产业的出口能力在下降,特别是一些传统产品,例如,纺织、服装、鞋帽、家具产品等出口。有些国家绝对的出口量会在几年之内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而我们基本上还保持在一个增长的速度上。

(5) 资源供给的紧张,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紧张问题,如果在一个国际环境比较好的时候,无论价格怎么波动,还是可以解决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既带来了生活质量的下降,也是很多社会问题的起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增长比较快的发达国家都有这么一段困难的时期,就是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我国也很明显。2005 年以后,群体性事件当中环境问题已经是排到前几位,既带来了经济问题,也带来了社会压力。

(6) 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社会稳定难题变得很多。在众多影响因素中,由于体制带来的两个方面的压力突出:一是相对收入差距短期扩大比较快,二是传统的城乡分割体制,比其他很多类型的国家城乡的差距都大。

但是,江小涓研究员认为,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整个收入线拉得较长,使得我们对所有产业转换规模经济的约束并不担心;虽然我们的成本在上升,但是我们的综合竞争力还是会维持比较长的时间,经济全球化还是在深入发展,我们很多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业配套的能力在全球性价比都是很好的。因此,面对这些新的问题,新的有利条件,下一步的发展,要有新的制度安排。

新阶段保持综合竞争力的关键在哪里?江小涓研究员阐述了下一个阶段国家继续保持增长的关键点。一是要靠劳动力生产率上升快于劳动成本的上升。二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上升快于总成本的上升。三是要使效率与公平关系调整的净结果为正。从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讲,不同要素稀缺程度是不一样的,不同要素在市场上的地位不同,不同要素之间分配关系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更加重

视公平。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问题压力增长,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本身就对下一步持续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需要调整,但是调整有一个底线,调整后的净结果应该为正。我们有一个判断,就是在把蛋糕重新分配的同时,一定要有把蛋糕做大的前提,这就是底线。所有的努力加起来,重新分配是对的,但是最后是大家共同把这个蛋糕往大里做。实现上述三点,存在着三个决定因素:创新、体制和开放。

最近两年,中央对科技创新特别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科技自主创新放在了第一位。我们的研发投入比重现在在全球占到了第四位,已经是全球研发投入的大国。在我们讲自主创新的时候,依然坚持了开放创新,既包括原始创新也包括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是经我们自己集成以后获得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的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是自主创新。经济全球化很重要一个标志就是科技全球化。

江小涓研究员就“开放因素在保持竞争力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做了进一步阐述。从输入和输出两个角度看,我们要输入一种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条件,使国内资源更匹配,推进体制改革,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在要素总量增长放缓的前提下,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并输出劳动生产率提高后所生产的产品。因为价格下降以后,将来出口的竞争力是要靠劳动生产率提高来保证。我们希望有这样的变化,那么外部有没有条件呢?今天讲这个问题,正赶上次贷危机引起全球经济非常不稳定的时期,是不是表示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大的变化呢?美国这种干预经济的方式,使得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则被调整了,有了变化。它对未来的长期影响,我们还要好好地再想一下。但是走到目前这一步,危机还基本上定在金融领域之内波动,前几轮我们不敢说得很死,变化确实是一个新的变化。

总体上讲,全球化还在深入发展,为我们下一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外部还是有比较高的期待。这两条是我们开放中很具体的工作。提高劳动生产率很重要一条是要发展服务业,就是指低能耗、高劳动密集、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从全球来看,服务业是全球的主导力量。从服务业跨国投资来讲,所占的比例已经将近达到 2/3,这和我们现在吸引外资的结构相比有明显的变化,以前服务业所占的比例不到 1/3,我们吸引外资的结构和全球跨国投资的结构是错位的。我们未来的机遇就是存在着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有效利用全球资源,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输入生产率提高的条件方面,一个具体内容是,能不能有技术来源?我们看到,科技全球化发展迅速,新技术和研发能力,人力资本都在大量跨境流动。关于利用全球资源提高竞争力问题,这里涉及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技术和智力。

回顾总结中国过去 30 年的历程,开放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区。市场化的程度,产品和要素组合方式,都要适合那样一种开放需要。我们从特区开始,从外贸体制,很多都是开放以后带来的新体制和开放带来的体制共享。所以,下一步的工作是开放促改革。当然,要高度重视防范开放风险,特别是次贷危机以后,资本市场的开放,在虚拟衍生产品的交易方面,应该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层面上提早具备防范、监管和应对的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新特征，对开放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从外部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是我国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有效利用全球资源，促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好服务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的机遇，以及利用开放促进改革，是下一步开放的重点工作。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郑新立研究员做了题为“从五个方面看未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主题报告。郑新立研究员指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快速增长的新阶段。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任务，是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最大的潜力所在。他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1) 关于当前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问题。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平稳、快速增长的新阶段。2007年下半年出现了消费价格上涨的势头，而且涨得很猛。截至2008年年初上涨到8%，那么，会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宏观政策采取了什么对策？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8年的宏观调控“双防”的方针，分析上半年经济走势后发现，物价从5月份出现拐点，往下走了。物价上来比较快，下来也比较快。所以，中央在年中发了一个文件，就是把宏观调控的政策基调由“双防”改为“一保一控”，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上涨的势头。2009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今年下半年提出的“一保一控”基调，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上涨的势头；二是“双保”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保持市场的基本稳定。这是我们宏观调控政策的一个基调。

(2) 如何以扩大内需弥补对美出口增速下降的影响。美国新自由经济奉行下的次贷危机现在发展到向保险领域和传统的商业银行领域蔓延。银行的信用、违约等问题的爆发，对国际金融将产生重大冲击。其爆发力度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比次贷的影响要好几倍。现在美国的信用、违约等的金融资金总额已达62万亿美元。如果这部分出了问题，大概美国整个的金融损失要达到1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两房”的损失，对国际金融的冲击要大得多。现在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历5个冲击波了，根据分析，预测可能还有3个冲击波出现。2009年3月份一个，2010年还有一个，一直延续到2012年，而且后面的冲击波可能要大于前面的冲击波。美国特别是金融领域受到的冲击，包括房价的下跌，给整个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中期来看，有可能面临着衰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着我国对美出口增长，我们应该通过扩大内需，弥补对美出口增速的下降。扩大内需的途径有加大铁路建设，加大节能降耗减排设备更新和改造要素投入，加大石油替代能源的建设，扶持规模化养殖和食用油料基地的发展，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铁路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美国有27万公里，我们只有7万多公里，全国铁路有130多个路段，铁路货运的满足率只有30%。今年国家发改委搞了一个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引进社会资金，争取把铁路搞得快一点。今后一段时期，应当是中国铁路建设的黄金时期。地方搞铁路的积极性很高，铁路的适应能力、施工能力、铁路设备制造能力强，所以要把铁路搞得快一些，把铁路建设搞上去。

在加大石油替代能源的建设方面，要加强对非粮食生物质能及电动汽车的开发利用。目前，进口石油对我们压力很大，一年花几千亿美元来进口石油，太令人心疼了。我们的资源就是缺油，但是煤比较多。如何把煤变成能够替代石油的燃料？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

(3) 如何把有效的产业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灵活的货币政策结合起来。郑新立研究员提出了六点建议：一是鼓励自主创新。在自主创新方面，要考虑怎样使大企业建立起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的问题。现在关键是企业还没有建立起技术开发投入的机制。在企业资产的考核方面，只包括有形资产，而对无形资产的增加，目前却没有一套考核的办法。企业花了很多钱搞科研，有了研究成果，但研究成果没有人评价，算不到资产里面去，这说明我们的资产管理太落后了。目前，对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起决定作用的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但是，现在对国有企业的考核却不包括无形资产。大家可以对怎么建立一个有利于激励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扩大研发的机制进行研究。二是鼓励扩大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的消费。2007年，山东省农民购买家电得到财政补贴，使得海尔家电销售额有了很大的增长。三是鼓励中小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四是鼓励发展物流、科研等生产型服务研究。五是支持农业现代化。六是理顺粮食、能源、资源等产品的价格。要把总的物价上涨幅度控制在5%以内，保持市场稳定，借助这个机会把粮食、能源、资源的产品价格理顺。

(4) 如何抓住机遇扩大海外并购和能源、资源的投资。我国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9000多亿是美国的债券，5000多亿是美国的国债，剩下是两行的债券。我们既要承担美元贬值的风险，收益又较低。30年全国人民省吃俭用积累的财富，不能让美国人通过美元贬值一下子蒸发掉！郑新立研究员认为，应把1.8万亿美元集中用于解决今后国民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技术瓶颈；能源、资源的瓶颈。要通过海外并购，并购那些比较好的有技术资源的企业，通过引进智力创新，来提升我们国内工业的技术水平。现在看来，引智创新可能是效益最好的。

此外，我们要通过海外能源解决国内资源短缺的问题。现在国家鼓励大企业走出去，鼓励小企业走出去，而且把企业走出去同政府的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一个齐力。最近浙江的一个民营企业，拿到了美国几个矿井的石油开采权。如果是中石油、中石化去，根本不可能拿到。但是小企业拿到勘探权以后，没有技术能力和投资能力，所以，大企业在后面跟着联合进行开发，再跟上政府的经济援助，比如，修路、修港口和铁路等配套设施，那么，就补充了国家的能源需求。

(5) 如何建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三鹿奶粉事件的出现，提示我们要把工业的标准化、社会化的大发展和科学的质量体系，纳入到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里面去。郑新立研究员提出了五点建议：①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保障体系。②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的检测、检验体系。③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的利益保障体系。食品生产要有一个合作社，合作社要有一个共同的品牌，每个品牌都有原产地的标识，出了问题要能够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生产的？要有一套保障体系和措施，让生产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来关心它的产品质量和品牌信誉。④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的法律保障体系。这涉及食品卫生

法、食品安全法等。⑤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的社会保障和举报体系。发挥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并且敢于让外国人挑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不能光靠道德来约束我们的质量安全，也不能只靠说教。有这五道防线，我们的食品安全就不会出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佳贵研究员对我国未来经济趋势和政策取向的判断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改变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国情，使我国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变成了一个工业经济大国和世界性的经济大国。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从产业结构看，工业生产产值占决定的主导地位。二是我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产业，例如，钢材、水泥、棉纱、棉布等很多产业位居世界第一。三是从进出口贸易角度看，我国已经成为了一个进出口的贸易大国，工业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四是从具体的工业化进程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接下来的主要任务是提升工业质量，从而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五是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和为工业服务的业务。六是我国已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开始反哺农业。陈佳贵研究员指出，中国还不是一个工业强国，工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我国的工业结构正在升级，亟须解决加工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高新技术产业水平和研究开发的能力较低，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发展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因此，要建设工业强国的基本经济国情，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工业现代化的进程，积极推进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升级，提高工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区域工业协调发展，积极开发新能源和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研究员指出，30年来，我国的工业规模、结构和水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北京奥运会改变了北京的城市面貌，却并没有改变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吕政研究员明确表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面临一系列的矛盾，但是相对快速增长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二、关于工业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和任务问题

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建立，并不断完善。那么，对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影响要素是什么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研究员认为，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举足轻重。金碚研究员阐述了以下三个观点：一是改革开放始于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始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念，而工业的成就无疑是最重要的检验标准之一。二是中国改革最彻底、开放最彻底的领域是工业领域。我国工业的增长比第一产业，甚至比第三产业增长还要快，原因是工业的改革是走得最快的，开放是最彻底的。三是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也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要依靠工业的发展来做出答案。可以

说,到目前为止,所有重大问题的解决,都要依赖于工业的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工业化的逻辑。具体地,它涉及以下三个问题:①要用商品生产商品,要由商品生产商品。②用资源解决资源。要开发、利用、交换、配置资源。③用发展协调发展。发展中出现了问题,必须用发展来解决。所以,金碚研究员强调,在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工业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当然,我们的工业面临着更加艰巨的历史使命。

吕政研究员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工业在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又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例如,资源环境约束与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矛盾,劳动力成本上升与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矛盾,工业集中化趋势与区域协调发展的矛盾,推动产业升级和缺乏核心技术的矛盾。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社会分配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扩大出口与经济环境变化的矛盾,生产社会化的要求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矛盾,追求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传统民营价值文化观念与民营经营转型客观要求的矛盾,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与加强政府对市场监管的矛盾,扩大对外开放与维护本国产业安全的矛盾等,这些问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既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普遍问题,又具有中国的特殊性。由此我们看到,在发展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中国工业经济学科的任务是,在继续揭示经济运作的深度上,对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给予科学的回答。

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卢福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工业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工业规模显著扩大;工业经济效益明显改善;工业化水平持续上升;工业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以及工业竞争力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但是,中国工业目前仍然面临着五大矛盾:工业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之间的矛盾;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与自主创新能力低的矛盾;巨额贸易顺差与平衡国际收支的矛盾;产业结构升级与劳动力资源状况的结构性矛盾;体制改革深化与既得利益集团阻力增大的矛盾。理顺上述五大矛盾的根本途径在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探索出一条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简新华教授从“中国经济模式及其成功经验”的角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背景和条件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有政治权威,执行了正确决策,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中国模式”创新的基本保证。二是重要因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比较优势。三是工业基础。改革开放30年,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教授认为,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国产业的发展 and 竞争优势的进一步提升,仍然是工业实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中的前沿问题。在产业经济学科建设上,除了引入产业组织理论以外,在产业经济学下

组合起来的部门经济学，也在不断探索各自领域特有的问题，不断深入。同时，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产业经济一般的理论也正在形成。文魁教授认为，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经济学形成和积淀的特有优势，再结合国外引入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一定会使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框架下，发展出自己的特点和风格。

三、关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体系和产业政策的问题

(一) 产业结构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教授在题为“高成长、资源约束与产业升级”的发言中阐述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当前由于高成本和资源约束，使得中国的产业发展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面临重大挑战，特别是产业升级的挑战。二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其中推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就是对产业进口管制不断地放松，使得很多产业特别是那些竞争性的制造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三是下一轮产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发展，应该分类管理对服务业的开放和对服务业的管制。干春晖教授强调指出，过去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业的经验不是很成功，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制造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当其金融业开放的时候，却不慎通过金融业又流失掉财富，从而出现制造业创造财富，金融业流失财富的现象。

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王述英教授针对工业化进程当中的产业结构跨越式升级进行了研究。我国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导致了工业化的进程缓慢和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在信息化时代，通过信息技术创新和发挥后发优势，不仅可以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并行和相互促进的新工业化道路，还可以在产业发展的顺序、产业转移和结构转化过程中，实现某些技术和产业突破式的发展，打破产业结构常规渐进式的演变，实现产业结构跨越式的升级。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MBA 学院汪海粟教授针对后转轨时期中国产业再转型问题指出，在后转轨期间，要聚焦三类企业：一是事业企业，包括大量的研究院所、医院，很多学校未来很可能也要企业化。二是垄断产业中的企业，因为垄断行业中的企业越来越多，它们的资源配置优势导致了不公平竞争问题。三是两类创业企业，即原始创业企业和二次创业企业。在未来的后转轨期间，这三类企业问题的解决需要非常规无形资产来驱动，比如网络、标准等。在企业交易过程中，非常规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产生绩效。许多外国企业在并购中国企业的时候，很看重中国企业的非常规无形资产。所以，应该加强对企业非常规无形资产的评估研究。

辽宁大学研究生院唐晓华教授针对“大企业集群与新型产业基地发展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一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发展必须构建新型的装备制造制造业基地。其依据有三个：①东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刚性非常明显。②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有独特优势和产业基础，聚集了一大批成套装备制造

企业，它们或者在国内销售额名列前茅，或者已跻身于世界同行业的大企业行列。^③再工业化道路（即与工业化、后工业化战略，包括城市化和信息化概念相关联的发展道路）中，要发挥原有装备制造业的优势，利用其所在的产业链和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等方面的优势，来实现区域性的竞争。二是要发挥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选择大企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因为通过区域结构集群，更容易形成竞争优势。企业集群不仅有多样性的关联效益和链接效益，还有创新互动作用，更容易形成产业竞争力。

西南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李一鸣教授研究了省级区域产业跨越式发展问题，通过对后发优势、赶超战略和跨越发展理论的回顾，探寻符合省级区域产业现阶段跨越式发展需要的模式与路径，针对四川省农业、工业、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四个跨越”，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模式以及具体的路径。天津商业大学刘辉群讲师针对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通过构建 FDI 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的数理模型，分析了 FDI 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刘辉群老师认为，FDI 会直接改变一国的产业结构。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FDI 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赵西三老师研究了生态文明的视角对产业结构理论的扩展问题，他认为，合理的产业结构不是调整出来的，而是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演进而来的，生态文明视角下产业结构的生态转型需要转变资源和环境这两个约束条件，在政策上要由强制性产业升级向诱导性产业升级转变，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上海财经大学郑若谷博士基于 1978 年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生产要素的构成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要素生产力的阶段差异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产业结构的生产率增长效率，揭示了劳动和资本对产业结构的波动影响程度及其阶段性特征。

（二）产业组织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费方域教授对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围，总结为四个要点：①产业组织理论最主要的主体部分就是市场结构、行为与绩效。②后来的研究把企业的性质、边界与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科斯以后提出了资源配置，不仅在市场上，而且在企业中间进行。③反垄断与管制。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还应该把企业间组织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④外包实际上也是联盟的一种形式。生产外包、销售外包尤其是联合外包，以及生产联盟、销售联盟、技术开发的联盟很重要，这部分的活动应当加入产业组织研究中去。

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杨永忠教授在研究中建立了强制性制度与诱致性制度的互补与冲突的基本概念模型，并结合 1997 年后我国电力产业改革和 2002 年出现的电荒问题着重从电力行业的角度对电力产业的制度，包括企业制度、竞争制度、电价制度等，进行了互补与冲突分析。他认为，强制性制度与诱致性制度的互补与冲突是我国电力产业改革成败与否的重要原因。

中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吴金明教授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难题与破解进行了阐述。改革中出现的三大难题是：存续企业问题、边缘性企业问题和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问题。破解这三个难题的基本思路是：针对存续企业问题应将存续企业

与主业上市公司的业务基于产业价值链进行重组再造，并根据不同的主业上市公司类型采取不同的再造方式；针对边缘性企业的治理问题，其核心是从深化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入手，按照“超产权理论”的要求引入商业化竞争；针对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问题的解决，应采用“谱系法、分步走”进行改革，把企业进行分类别、分步骤的管理和改革。

（三）产业体系

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张耀辉教授对产业结构关系和产业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传统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物质资本为基础，以数量竞争为手段。他概括了现代产业体系的七个性质：①适应创新竞争。②追求外部规模经济。③需要更加灵活的外部协作。④追求知识创造、知识转化。⑤要求快速沟通和流通。⑥政府深度参与。⑦受到新型制度保障。现代产业体系是以知识生产为龙头，以知识转化为基点，以快速反应、快速协调为手段，企业间高度相互依存，外部分工细密，以信息和物流为基础，政府充分参与和有现代制度为保障的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的形成过程有两个机制：内生机制和政府推进机制。内生机制，是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要用创新代替壁垒，形成一种推进企业创新竞争的机制。政府推进机制，是指政府的作为在于创造外部条件，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诱导企业创新这样一种基本产业体系构架，又称政府外生性结构。我们要看到市场是不能由政府代替的，规制永远跟不上创新。尽管这是外生性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但是政府必须退出。

（四）产业政策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汪斌教授研究了产业特征与创新效率的关系。针对我国东部地区，选取了五个区域产业特征指标：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权结构、区域行业集中度、区域对外开放度、区域企业规模，选取了两个创新效率指标：创新产出率和创新集中度。研究发现：①在东部地区高技术企业区域产业结构对创新效率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关于区域产权结构，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的能力更强，外资有正向作用。③区域行业集中度对东部地区创新效率的提高呈现出显著的负面作用。④区域对外开放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尽管东部地区大量的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但是这些贸易往往锁定在低成本的生产模式和技术路径上，从而抑制了企业的创新动力。⑤区域企业规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的规模大小并没有对区域的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林汉川教授指出，民间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单一的国家科技管理机构不能完全促进一个国家自主创新事业的长久发展，只有建立官民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才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所谓民间创新活动，根据我国现在的环境体制，是指除国家和国家控股之外的，非公有制的，以民间、民办和民营为表现形式的，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科技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改革开放以来，在民间创新方面还缺乏管理，存在诸多问题，

如缺乏科学认识；缺乏创新体制；缺乏创新政策；缺乏创新环境；缺乏创新文化。针对我国民间创新中存在的问题，他提出政策建议：把民间创新活动纳入国家创新体系；要建立与完善民间创新活动的组织管理体制、扶持与激励政策、人才发现与培育政策、交流合作与转化政策、成果的评价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有利于民间创新活动发展的文化氛围等。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坚教授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是构建以能力为导向的、竞争性的产业。产业政策有两个理论基础：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关于比较优势，仅以华为和深圳现象为例，说明中国在自主研发上具有比较优势。关于规模经济，企业能力理论能够解释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现在许多人对规模经济的理解是错误的，从而阻碍了产业的发展。铁路建设可能是今后国家最大的投资项目，但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其原因是政企不分。已经批准的高速客运专线就要开始施工了，该项目完成后，铁道部的负债将达到 1.2 万亿元。目前一项研究显示，铁路的政企不分会带来 4~5 年以后比美国次贷危机更难处理的风险。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赵锡斌教授以一个大型国有企业（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的艰难改革历程为例，指出坚持自主创新对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企业一开始就被逼上了自主创新的道路，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极为困难的时期，企业也千方百计出资金搞研发，从而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首次、首台、填补空白、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标志性产品。事实证明，坚持了正确的产业政策，即使是在企业发展的低谷阶段，企业也同样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关于垄断行业改革与产业规制问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戚聿东教授就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模式与路径提出了三个观点。①被称之为取得中国奇迹的改革领域，主要是发生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就遍布 14 个行业的垄断行业领域来讲，改革总体还没有进行。②即使在竞争性的产业领域，还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产生机制还没有改革。组织人事制度 30 年不但没有改，而且收缩，甚至进一步僵化。在中国，一把手这种特定的命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具有深远影响。国有企业领导人具有双重属性，他们是经济人加政治人，既要对市场负责，还要对市长负责，目前更主要对市长负责。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国有企业领导人会把双重属性延伸传递到企业内部，所以注定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的企业。③就垄断行业的竞争本身而言，竞争模式有着多种多样的选择模式。除了竞争模式的选择以外，产业模式、治理模式、运营模式、价格模式、规制模式，都在根本上和深层次上决定了垄断行业改革的绩效。长期以来，我们只是在竞争性领域做文章，而忽视了中国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使得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地深入下去。根据系统论观点，任何单一要素的改革，都无助于系统整体功能的强化。我们应该坚持产权、治理、运营、竞争、价格、规制六个方面整体设计，并借鉴竞争性领域产业改革的经验，循序渐进。所以，在垄断行业上如同

竞争性改革一样，既不是战略决定成败，也不是细节决定成败，而是系统决定成败。

浙江财经学院王俊豪教授就大部制背景下垄断性产业的管制机构改革问题提出了五个观点。一是大部制要求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改革。电力产业是一个管制职能非常分散、管制职责不清等类似问题较为突出的典型产业。二是政府行政部与垄断性产业管制机构的关系有三种表现：①政府管制是对原来国有制解决垄断性产业市场失灵的替代性制度安排；②政府行政部与管制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职能是宏观调控，以及在中国政治上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后者在微观政策上对垄断性企业进行管制，主要是进入价格、质量等方面；③政府行政部与管制机构的联系，是政府行政部的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实施要通过微观企业得到落实。政府管制机构对微观企业的有效管制，就能够促进垄断性产业的发展。三是国家能源局是能源产业大部制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性政府部门。四是能源产业真正实现大部制的标志性特点，就是成立能源部，实行政府行政部门下面相对独立的管制机构。五是电力管制机构要具有动态性。要对管制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和产业融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电力管制机构改革也要相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卢东斌教授对控股垄断性企业中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问题提出了“一个前提、两个基本点”模型。一个前提是在国有公司中应该坚持一个国有股为主的方针，这是其垄断性质决定的。两个基本点：①控股股东的比例要坚持，专门委员会数目要增加，要强调科学管理。②处理好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于良春教授对地区性行政垄断测度指数进行了研究。基于对我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的制度类指标，行为、绩效指标进行汇总后得到的行政垄断指数，1985 年以来，中国地区性行政垄断程度趋于下降，但在不同的时间段其下降的幅度不同，在最近几年又有所反弹。另外，他将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域后发现，各个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变化比较大，有些地区上升比较多，有些下降得比较多。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白让让副教授针对煤电关系长期扭曲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假设：①GDP 效应假设。在综合传统的低价竞争的模式下，富裕资源的价格会受到来自体制的扭曲，这样的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就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地位。②利益集团假设。相对电力产业而言，煤炭产业在产业集中度的高低、产业组织模式的紧凑性、产业参与者的同质性，以及产业所有权的配置模式这四个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这成为受长期规制的一个重要原因。③规制者效率与“惰性”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干预煤炭产业的价格相对于直接调节电价能够节约规制者成本。

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于立教授和王建林博士认为，“电荒”问题是近几年困扰国民经济的热点问题，事实上，煤炭行业上游环节的市场价加下游环节的计划价的纵向双轨制，才是带来“电荒”的根本问题。依据实证研究结果，即“电力缺口与煤炭价格相互影响，电力缺口显著影响电力价格”，他们认为，电力、煤炭都回到“计划轨”的倒退方案可能成为有效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稳定煤炭市场，改革电力市场的纵向政策调整思路。

于立教授和王建林博士指出，以前我们讲的是横向价格双轨制，现在讲纵向价格